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第二辑(五)

•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 •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

——从道安到傅雷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CHINESE TRADITION

(From Dao An to Fu Lei)

王宏印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王宏印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第2辑;5)

ISBN 7-5351-3608-7

I.中… II.王… III.翻译理论—研究—中国

IV.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2916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版 次: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235 千字

(430034·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145 号)
6 插页 9.75 印张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51-3608-7/G·2924

定价:28.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序

杨自俭

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去年在石家庄河北师大召开中国典籍英译学术讨论会，会间王宏印教授送来他的大作《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手稿，让我看后给他提些意见并作序，先是看了大作的“上编：古代部分”、“中编：近代部分”与“下编：当代部分”。后来王教授根据本书系统与教学的需要又写了一个“余编：新译学探索”，对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作了更具体的工作，展示了现代转化的成果。这一部分从逻辑上说是转化的必然结果，从这本书来讲使它的体系更加完整，所以这个余编并不是多余的，而是研究深化的结果，是十分必要的。

王老师这本书是为翻译方向博士生编写的教材，更准确的说，这是一部属于理论翻译学的专著。这本书是史论结合，以论为主。从外部把中国传统译论划分成古代、近现代、当代三个时期，从内部即译学发展过程划分为肇始、古典、玄思、直觉四个阶段；从传统译论中梳理出文派与质派、音译与意译、直译与重译、译意与译味、神似与形似、翻译标准、可译性、境

界、译者以及语言等 10 个问题,在此基础上逐一给予现代的诠释,从而转化为现代译学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标准与原则、主体性、可译性等 6 个问题,同时还发现传统译论中所缺乏研究的 5 个理论问题:翻译过程、效果评价、文体对应、语义转换与翻译批评。全书是经过梳理、阐释、转换(用转化可能更好些)、终结、升华等过程而完成的,这种方法既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又有很高的方法论价值,在我国译学的研究领域有不可低估的开创性意义,特别在传统译论的研究上,这本书不能不说是新时期开始的重要标志。

对我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阐释是一件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首先由于我们的汉语文字的固有特点,再加上古代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传统译论的范畴、概念、命题就显得格外地难以分析和判断。其次,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大都是流变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多层面的交叉与包容关系,许多观念、命题潜藏于浩瀚的史料和译论家的只言片语中,所以,尽管许多人知道传统译论中有宝,但迟迟无人去探索去获取,或者有人从小路走近山麓捡了块石头便畏难而归。王老师是一位不畏艰难走进山里的探宝者,他的这项研究本身也值得译界关注和研究。

此外王老师通过自己的探索,还在书的余编中总结出:立名、走笔、简洁、规整、意韵、形象、节奏、连贯、谋篇、标题等十种翻译表现手法。他针对文学翻译批评还提出了六条标准:体制、诗味、语言、文化、倾向、风格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译作划分为妙译、佳译、拙译三个等级。这些成果今后都会对文学翻译研究起到开拓和推动作用。

这本书还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内容,前十章每章后面都有 20 个思考题,而且大都是没有标准答案、颇能引人思考、令人产生兴趣的问题,对读者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打开了许多新

的思路。教学的思想性在于除了讲清楚理论观念以外,还要讲清楚研究的方法,其实还应再加一条,要出好思考题。不可低估这一条的重要作用,特别对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有了重要的思考题,就很可能激发他们更浓厚的学习兴趣,使之逐步走上认真研究的道路。王老师出的思考题很有水平,涉及的内容很多,既有对概念、范畴、命题的探究,又有背景、原因的追寻,有古与今和中与外的比较,还有相关学科的关联,既有理论的思辨又有史实的考据,有哲学的思考,也有译学的构建等等。这种多学科、多层面、多视角的思考题,对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和创新能力的产生巨大的作用。

读了王宏印老师的书稿,我想得较多的是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前几年我在《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一文中,针对传统译论自成体系问题提出了三个理论问题:(1)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有无独具特色的译论体系?(2)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中西方是否有类似的内部结构系统?(3)如何建设既不同于我国传统的也不同于西方的一种新的译学理论体系?此外还在《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一文中提出了译学建设的5个支柱:(1)中国传统译学的继承性研究;(2)外国译学的借鉴性研究;(3)翻译实践(包括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4)相关性学科的吸融性研究;(5)方法论的多层次性研究(包括本学科的、相关学科的、系统科学的、哲学的多个层次)。现在想在上述问题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就译学建设中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1. 关于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问题。如何对待传统问题一直是人文科学各学科理论建设中的大问题,这里主要有继承什么和如何继承两个问题。精神的继承不同于物质的继承,物质的继承可以是一代传一代,一直原形不变的传下去,这就是传家宝。但中国也有家训相传,不过那是话语代代传

承,话语形式可能不变,但内容会因时空的不同而变化。看来精神的继承是要随时空的变迁而变化的。所以今天讨论传统译论的继承问题,就必须联系今天的时代、社会现状以及本学科发展状况来进行,也就是说要跟我们现代人的创新研究相结合。如何创新?创新的起点何在?章太炎主张“守旧”而后“出新”,胡适则认定“破旧”方能“立新”。(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226页)贺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说:“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惊世骇俗,争奇斗艳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文化与人生》第51页)汤一介在《谁之传统,谁之使命》的访谈录中说:“对于中国文化甚至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你只有把它批判透了,然后才能真正发现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才能继续发展它;如果不把它不适应现代生活要求的那些东西批判透了,反而无法发现它的真精神在哪里。”(赵汀阳主编《论证》第121页)从上面的说法可以看出,章太炎和贺麟二人的看法基本上相同,“新”存在“旧”之中,我们只要研究旧的就能发现新的,而不是彻底批判了旧的,才能发现新的起点,进而建立新的。而胡适和汤一介的看法大体上一致,“旧”中有“新”,但旧的批判不透,新的也找不到,所以胡适说“破旧”才能“立新”。不管守旧出新,还是破旧出新,但新都存在旧之中,也就是贺麟说的,“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这就是说要创新就必须是对传统的继承,而不是嫁接或移植,更不是抛弃传统,全盘外化。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新与旧的界限是什么?二者是以什么为参照物来区分的?比如翻译标准“信”这个范畴中旧的内容是什么?新的内容是什么?如何从中分出新与旧的内容来?是旧中包含着新等人去发现呢?还是现代人用现代的思想在解释旧的过程中去创新?我想应



该是后者,实际就是对传统的东西进行现代的阐释,在找到古今通约性的基础上,通过现代转化使传统的东西进入现代文化传统。

2. 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传统的怎么能转化为现代的?首先我们应搞清楚能不能转化?译学的理论成果和其他人文社科理论成果一样,虽有时代和本土的特征,但他们都有通约性,都有古今中外相互继承和借鉴的内容,表面形态的差异不妨碍科学精神的相通与传承,显然对传统译论可以做现代转化工作。其次还要明白转化什么?我们认为转化的内容并不简单,它应该涉及下列思想:(1)顺应时代潮流,立足发展中国译学;(2)用古今中外打通的思想和比较研究的方法;(3)以现代译学的范畴、命题、系统为参照系;(4)对传统译论进行整理、解释、继承、发展转化的工作。其关键部分是通过现代转化达到继承传统译论的科学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目的,以促进新译学的建设。这种转化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移植和对接,而是传统理论成果内在精神价值的转化。(浦震元《中国文化研究》2002冬之卷,第9-12页)

3. 如何进一步做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工作?这个问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我只讲我认为最要紧的几个问题。

(1)关于哲学范畴问题。汉语“范畴”一词出自《尚书·洪范》,原指归类范物,是箕子回答武王治国安民的道理、次序问题,提出了“洪范九畴”:五行;敬用五事;农用八政;协用五纪;建用皇极;又用三德;明用稽疑;念用庶征;响用五福、威用六极。它是治国安民应注意和遵循的九类观念与原则,主要是规范人的行为,含有价值规范和制度法则的意义。它的特点是规范人的行为和用观物体道的方法认识宇宙,不愿意对事物进行抽象的认识和结构分析,不接受逻辑与知性的批判,其实践性与伦理化特点突出。而西方的范畴(英语为 category)

来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普遍性概念的考察。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十大范畴:本质、类;量;质;关系;地点;时间;处境;所有;动作;受作。后来康德和黑格尔对范畴研究都作出了划时代的重大贡献。西方范畴是一种逻辑形式,它是反映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类别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追求的是客观事物之间合于规律的关系,既有逻辑意义又有本体论的意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逻辑形式和工具,在理论上具有普遍性,在形态上虽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随时代和人类认识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中国的范畴依从“亦此亦彼”的辩证逻辑,西方范畴则依从“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中国的范畴重综合,重功能,其内涵多元游移;西方的范畴依据同一律,重分析,重结构,其内涵相对明确稳定。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其核心是这个民族的哲学,其他各学科都要受哲学的制约,上述两种哲学范畴模式,也一定会影响中西译学范畴的构建、确立与发展。这件事我们过去没有做,没有认真研究,没有对哲学范畴进行其理论规定性的探讨,更没有进行中西哲学范畴的比较。研究译论基本上都是就译论谈译论,既不研究基本范畴,也不涉及哲学。因此,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随之而来的两个问题就产生了,一是对传统译学范畴自身特点的研究很少;二是对传统译学范畴体系也无从进行理性的鉴定。就是钱钟书和罗新璋的研究在上述问题上也没有什么突破。今天来看,这些问题只有认真进行三个层面(哲学范畴、译学范畴、译学范畴体系)的中西比较研究才可能打破原来的局面,逐步走向深入。这是我们做传统译论现代转化首先应该抓住的一个重要问题。

(2)关于译学元范畴的问题。元范畴(*metacategory*)不依其他范畴为存在的依据,也不依其他范畴规定自己的性质和意义的边界,它是抽象程度最高的范畴,其范围最广,其内容最深刻,其生命力最强最持久,而且产生的时间最早或很早。

此外它跟传统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因素关系密切,甚至是直接从哲学或美学等领域的范畴演化而来的。元范畴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从众多范畴中区分出最重要的范畴,从中发现这些最重要的范畴如何统贯和驱动整个范畴系统运行,在此基础上逐步发现并厘定传统译学范畴体系的整体框架。元范畴的研究不是一件易事,要从传统哲学范畴或传统文化深层根基中去探寻,而且要进行众多范畴的比较研究,要用上述元范畴的标准来衡量,这样才有可能把这项研究做好。(汪涌豪《范畴论》第1—6页,第418—426页)

(3)关于阐释与考据相结合的问题。我们过去对传统译学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史料的整理或以史代论的水平上,以致出现简单片面的问题。现在我们应对传统译学的历史、范畴、命题、体系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辨,同时把这种考辨和现代阐释结合起来。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过去那种就事论事简单片面的毛病,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阐释中凭臆空谈,曲解古人,从而实现现代转化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的要求。再一方面也是对当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分离甚至相互否定的这一片面性的批判。(蒲震元《中国文化研究》2002/冬之卷,第9—12页)

读了王宏印老师的书稿以后,又学习了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一些新的成果,才有了对上述问题的议论。当与不当,由读者评论,有用无用,由历史验证。是为序。

记于中国海洋大学 六三居室

2003年4月18日



目录

CONTENTS

序 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杨自俭 / 1

绪论 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译论的人文精神 / 1

上编 古代部分 (148—1840) / 9

第一章 翻译本体论的失落: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本体论诠释 / 11

第二章 译者主体性的经典论述:彦琮“八备”说的主体性地位 / 30

第三章 保守原著秘密的法宝:玄奘“五不翻”的真谛 / 50

第四章 翻译的语言策略:赞宁“六例”的方法论意义 / 71

中编 近现代部分 (1840—1949) / 95

第五章 回归写作的翻译理论基础:再论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 / 97

第六章 译名的本质在于命名:章士钊与胡以鲁关于音译意译的争论 / 121

第七章 翻译之是否可能的哲学沉思:贺麟论翻译的“言意之辨” / 141

第八章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划界:金岳霖论译意与译味 / 157

下编 当代部分 (1949—2000) / 175

第九章 翻译能达的境界:钱锺书翻译“化境”说的魅力 / 177

第十章 重神似不重形似:傅雷翻译艺术观之再考察 / 194

结 语 试论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 / 220

余 编 新译学探索(2000—2003) / 235

引 论 革新传统译论精神,迎接新译学的曙光 / 237

第一章 脱有形似,握手已违:昔日文质与今日直译意译辨析 / 246

第二章 俱道适往,著手成春:简释文学艺术翻译的表现手法 / 258

第三章 参古定法,望今制奇:探寻文学翻译批评的评判标准 / 276

后 记 / 288

主要参考文献 / 290

致读者 / 唐瑾 / 292

编辑的话、补记 / 唐瑾 / 298

绪 论

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译论 的人文精神

中国有无译论？

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幼稚的问题。然而人们确实问过这个问题，而且是很严肃地问过。

答曰“有”。因为有翻译实践。可是这个答案不算圆满。

中国有无译论体系？

就比较难以回答。要是问中国有无文艺学体系，回答当然再简单不过，因为有一本《文心雕龙》，谁也不能否认它的体大思精，影响深远。可是，“翻译学”上可曾有过这样一本像样的翻译理论专著？不要说专著，佛经翻译越千年，一篇题目专一、论述专一、结论专一的论文也难以找到。

可是我们有一本厚厚的《翻译论集》。

还有一本不太薄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翻开一看，许多是“序”和“跋”，或者是“例言”，“凡例”，“杂议”，甚至是“译余剩语”。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和梁启超的《论译书》。可是，“译才并世数严林”（康有为语，指严复和林纾）的二位的译论，仍然主要见于译序和译例言之中。即便再朝后，就连《翻译论集》的编纂者罗新璋先生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也是作为



《翻译论集》的序言而刊出。

这可真是无序不言了。

这便是中国的译论和译论体系,如果说可以称得上是体系的话。

但至少可以称得上传统。因为一个有几千年翻译实践的大国怎么可以没有译论传统?

因此,罗新璋先生在序言中便有一段发人深思的话:

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渐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经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据此,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的几层意思是十分明确的:

一、中国传统译论的渊源是古典文论与传统美学,其归宿是正在形成中的“翻译学”。

二、中国传统译论的体系已经形成,其主体或主流是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一基本线索。

三、中国现代译论体系的建立要“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就应包括这一传统的译论内容在内。

关于第一、第三点,笔者没有异议。关于第二点尚需作如下说明:

一、中国传统译论如果说有体系,也是在整体上而言,而

不是就某一单独的理论部分而言,因为大部分单独的论点尚未发展到卓然成一体系的完备状态。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尚未完备的译论观点和说法,加以系统的现代的诠释,使其向着现代的系统的理论形态过渡或完成。

二、虽然我们可以接受罗新璋先生的这一基本线索,并且考虑以之为核心部分,但是其余部分的译论有的也很重要,也需要包括,而且其他的理论致思方向也可以形成中国新的体系化的译论思路。但对于本书而言,我们的取舍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它对于一以贯之的中国现代译论的建立所潜藏的理论价值如何。此外,再无别的标准。

三、如果说,罗先生的上述线索是以文本转换为中心的思路的话,那么,它所表现出的翻译标准为核心的理论倾向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其理论问题是:何谓好的译文? 据此类推,别的可能的思路至少还有: A) 以音译和意译为基本的思路,从唐玄奘的“五不翻”到章士钊与胡以鲁关于音译和意译的论争。其理论问题是:何谓真正的翻译? B) 以质译文译和直译意译为主的译论方向,从释道安的质译倾向与鸠摩罗什的文译倾向到现代鲁迅与梁实秋关于直译意译的论争。其理论问题是:何谓好的翻译方法? C) 以彦琮的“八备”说为主体的建立译者主体的思路。其理论问题是:何谓真正合格的译者? 等等,不一而足。

四、中国传统译论如此包括了各方面的“有容乃大”,便有望增加中国译论传统的覆盖面和对于众多翻译理论问题的辐射力和渗透性;不仅可以在单独的个体译论的层面上进一步加深和扩展同一论题,而且可能在中国传统译论的整体态势和综合实力上展示和开拓现代译论的理论基础及其文化资源。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目前在罗新璋先生所做的开创性整理工作的基础上所能做的事情。那就是说,以中国传统译论

的文本为基础,进行现代译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的诠释工作,不仅是为了清理古典的译论资料,而且更重要的则是为建立现代译论准备条件。尽管老一辈学者包括梁启超、胡适、钱锺书等先生曾为之做过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但是因为治学方法的不同和理论视野的不同,他们的工作还应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推进。

关于中国传统译论的划界其实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简而言之,从古至今出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翻译理论,无论是何人所写,只要不是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都可以划归传统译论的范围。本来,就翻译史的情况而言,口译先于笔译,翻译实践先于翻译理论。但是由于翻译史所记载的资料有限或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反倒使人觉得翻译理论占了翻译史的很大篇幅。又从翻译理论史的情况来看,翻译后于创作(广义的创作),翻译理论后于创作理论(如文艺理论)。这一翻译理论的“置后律”,正可以解释何以一直到了佛经翻译开始以后一段时间才有了《法句经序》这样的“译论”。它同样可以说明何以要把清末民初开新学之风的梁启超的译论,当代翻译界仍然译必称“信达雅”的严复的译论,以及把生活在当代中国的钱锺书先生的译论,一并划归“传统译论”的范畴。甚至还有一个误解,那就是:钱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懂得多种外语,中西史料信手拈来,为什么还要说他的译论是传统的而不是现代的呢?那理由只有一个,就是看它发表的译论本身的理论兴趣、理论问题、理论方法、理论形态在本质上是属于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此外,再无别的划分标准。

那么,中国传统译论有哪些基本的特征呢?或者说,它有哪些可以归结到中国文化特点中去的人文精神呢?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丰富的人文传统的民族。多源头多



民族多语言的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在经过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激烈争鸣以后,归入了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思想领域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教和儒家思想的互补,以及由印度传入的佛教的中国化的渗入。祖先崇拜、伦理政治、诗品文心融为一体的人生方式和思想方式,构成中国人际交往和跨文化交往的大背景。中国传统译论的人文精神便奠基于这样一种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的人文教化传统之上。要而言之,中国传统译论的人文精神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道德为本位,强调译者道德修养和敬业从业为本的主体性意识。中国传统译论不同于西方的翻译理论喜欢把翻译视为一种技术性工作的态度,而是强调译者要全身心的投入其中并把它作为终生事业的敬业精神。这在彦琮关于翻译人才所需条件的“八备”中是居于首位的,对于每一个译者个人来说则应当是始终一贯的。

二、服务公众和社会的群体本位思想。因为中国文化的非宗教化和世俗化倾向,中国的翻译始终是面向大众的而不是面向少数教徒的,即便是佛经的翻译也有此倾向,即没有划分为教徒的和非教徒的译本。这一点不同于西方翻译史上基督教《圣经》反复被翻译的情况,也没有产生相信译者为神所共同感召的奇迹般的翻译实践和诸如此类的翻译理论。

三、人文主义的语言观而不是科学主义的语言观,始终是中国传统翻译实践的潜在的理论导向。由于缺乏高度发达的形式化的语言理论和语法理论,古汉语甚至现代汉语就一直处于人文主义的语言观的观照之下。缺乏分析哲学的条分缕析和演绎规则的操作化程序及其有关训练,使得中国传统译论在精神实质和表述方式上都比较模糊而随意。

四、人文社科类作为主要文本翻译的类型,在材料内容、语言类型和运思方式上都倾向于文学翻译的艺术性,而不是

科学翻译的科学性。久而久之,以至于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都往往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活动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不仅影响到中国传统译论的基本观点,而且影响到传统译论的表述方式和理论形态。

五、哲学的而非科学的、美学的而非宗教的,是中国传统译论的始终如一的理论基础。简约的而非繁丰的、定性的而非定量的,是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方法和表述特点。多解的而非单一的、含混的而非明晰的,是中国传统译论的文体特征和思维导向。音义之分、言意之辨、形神之似,因而便成为中国传统译论长期关注和争论不息的核心话题。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传统译论的人文精神固然有其值得肯定的特质,但也正暴露出它在理论上的诸多缺陷和匮乏。从今日建立现代翻译理论的要求的高度来看,这些缺点就不是一般的说说而已了,而是十分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了。兹总结数条如下,以供参考:

一、理论意识不强:也就是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拉得不够大。表现之一是许多发表理论见解的人本身是翻译家,而不是职业翻译理论家。他们的译论是议论式的而不是理论式的,谈论的是翻译的情况而不是对翻译的理论设定。基于个人直接经验者多而进行抽象理论思辨者少,内省式的直觉式的重复认识多而演绎式的论证式的理论展开少。结果,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理论文体,只能写出文笔优美的学术散文,和夹叙夹议的序跋小品。

二、基本范畴缺乏:理论体系的建立需要若干基本的理论范畴,以及这些范畴之间的逻辑的必然的联系和明晰的陈述,才能进行有效的判断和推导。由于传统译论多数借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艺学的术语,而这些术语又不做必要的界定和说明,这就使得某一理论家与其他理论家之间,译学与其他学科